

《中藏经》，又名《华氏中藏经》，旧题汉·华佗撰。

孙光荣释译

其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至第二十论为总论，第二十一至三十二论为论脏腑虚实寒热生死逆顺之法，第三十三至第四十九论为论杂病及决生死法，未附附以救急存疾诸方。



孙光荣 释译

中藏经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孙光荣释译《中藏经》

原 题：华氏中藏经 汉·华佗撰
释 译：孙光荣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光荣释译《中藏经》/ 孙光荣释译.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132-1537-4

I. ①孙… II. ①孙… III. ①中国医药学—中国—东汉时代②《中藏经》—注释
③《中藏经》—译文IV. ①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5501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6.5 字数 220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2-1537-4

*

定价 38.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前 言

一、《中藏经》内容简析

本书名《中藏经》，又名《华氏中藏经》，旧题汉·华佗撰。此书历来多认为系后人伪托之作，或疑六朝人手笔，或疑华佗弟子吴普、樊阿依华氏遗意辑录。但本书所具有之学术价值，则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全书共分三卷，上卷暨中卷共四十九论，下卷附方实计六十八道。通览全书，若按其内容区划，则可分为四部分：第一至第二十论为总论，第二十一至三十二论为论脏腑虚实寒热生死逆顺之法，第三十三至第四十九论为论杂病及决生死法，末则附以救急疗疾诸方。诸论分别详论天地、阴阳、水火、寒热、虚实、脉色、脏腑辨证及痹证、痞证、中风、水肿、脚气、淋证、癥瘕、积聚、痈疽、疔疮等。全书以脏腑脉证为中心，寻求《内经》（《黄帝内经》之简称）《难经》及上古医经中论阴阳、析寒热、分虚实、辨脏腑、言脉证之理，揆诸大旨，融会贯通，发挥蕴奥，最早形成以脉证为中心之脏腑辨证学说，奠定脏腑辨证之基础。且自成体系，具有系统、简明、精辟、实用、完整之五大特点。实乃自《内》（《黄帝内经》之简称）《难》（《难经》之简称）以降，理法方药俱备之最完整医经，其学术思想之影响，绵延不绝，泽及今世。

二、《中藏经》作者及成书年代初考

《中藏经》始载于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医方下，题曰《华氏中藏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为“中藏经一卷，汉谯郡华佗元化撰”。然而，关于本书及其作者之真伪，历代有所考辨而众说纷纭。有疑为邓处中所撰者，如《宋史·艺文志》题为“灵宝洞主探微真人撰”；有疑为六朝人之手笔者，如孙星衍；有统斥为“后人托名之作而又言具有元化之遗

意,或为华佗弟子所辑”者,如吕复;有言“虽非元化之书,要其说之精者必有所自者”,如周锡瓚;近人有言其纯属后人抄袭《内》《难》诸书而成者;亦有言祖本为华佗早年辑古医经而自撰者。统而言之,乃历代公认其为伪书,或谓真伪杂糅之书,致使《中藏经》沉淹千载。

何以称《中藏经》为伪书?历代考辨之辞千重万叠,归结之则主要依据有五:一为史载华佗之书“火于狱”;二为目录书所载晚见于宋;三为邓处中序荒诞不经;四为书中称述之书名、官名、病名、药名有出自汉后者;五为书中所论有多处与《内经》《脉经》等所言相类似。然,伪巧而难辨,则有真之而伪,伪之而真者,今试考辨之,谨备一说。

华佗之书“火于狱”,乃始自《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九,谓“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自此以降,一千六百余年来,誉为“神医”之华佗无书传世遂成历代医家之一大憾事。但稽其史言,仅知华佗索火烧之者惟“一卷”,且亦仅知为“此可以活人”之书,所以“火于狱”之说,尚不可断言华佗绝无遗著传世。《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唐书·文艺志》均分别著录有《华佗方》十卷、《华佗药方》十卷、《华氏药方》十卷,虽题曰吴普撰集,但亦足证华佗身后仍有华氏之书传于世者。

为何《中藏经》直至宋代始见于目录之书?《四部正讹》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因之,固可疑其伪。但如日人十街信敏《新校正中藏经叙》所言:“荆山之璧,由卞和传;丰城之剑,以雷焕闻。盖物隐显,虽自有时,亦俟其人耳。如华佗《中藏经》,是其然矣哉。”以史实观之,《中藏经》可因华佗遭害而隐,而由普阿辗转传出而显。况且,年移代革,兵燹水火,古籍之晚见于目录书者原非少见,后人整理而再传于世者甚多,岂非仅《中藏经》如此?周锡瓚《中藏经·跋》云:“世传医书,莫古于《素问》,王冰谓即汉《艺文志·黄帝内经》,然已不合十八卷之数,况后出之书耶?唯求是者信之而已。”

邓处中序自称华佗外孙,虽有《华佗别传》可考其次子邓思之名,但言因梦得书于石函之中,实荒诞不经。或言此乃避祸炫技之笔,但序中述及华佗“性贪,不悯生灵”及“果为魏所戮”等语,绝非“外孙”之所言,且

序末以干支纪年不著岁时亦有违古之历律，所以其伪甚明。今考周锡瓚跋云：“余得旧抄本，前后多缺，无序文目录并楼公跋，且避高孝两朝讳，疑即攻媿所校本。”足证本书始本无序。本次释译所引赵孟頫手写本亦无序，是否赵孟頫因其序文怪诞而不录？不然，孙星衍序云：“赵写本旁注有高宗孝宗庙讳，又称有库本陆本异同，是依宋本手录。元代不避宋讳，而不改其字，可见古人审慎阙疑之意。”由此可见，邓处中序当疑后世据《华佗别传》托邓处中之名而为之，非原书之序也。且邓序之托伪，非《素问》《灵枢》《本经》等因尊古贱今而托名以入其说，而是借名托梦以神其书而羸入贗作，此即所谓借真售伪者，与古贤之托名者有霄壤之别，所以邓序之伪诚可反佐《中藏经》之真。

《中藏经》四十九论中确以三种方式引用“金匱”之名，分别为“金匱”“金匱至真要论”“金匱大要论”，但并非王洙得自馆阁蠹简中之仲景《金匱》。考《素问》第四十六《病能论》谓：“《金匱》者，决死生也。”可见其为诊断专书。而《内经》引用《金匱》《大要》之名颇多，与《中藏经》所引均非仲景《金匱》之言。日人奈须恒德曾注云：“按《金匱》文不见《内经》，盖古医经也。”宽保本亦有眉批云：“盖上古《内经》有之，而今脱乎？”前贤之见甚明。至于书中官名、病名、药名有确出自汉后者，且大多为北宋末、南宋初之方药。但本次释译曾初探平津馆本附方及周本附方，经用赵本校勘，其药名出自汉以前之方，初步可界定六十道方，此则足证《中藏经》祖本非伪，而因后人转抄续貂，所以真伪相杂。今观孙本所存六十八方，竟无一方见于《肘后》（《肘后备急方》之简称）《千金》（《千金要方》之简称）《外台》（《外台秘要》之简称）者，而元化已见于《千金》《外台》之八道药方，反不见于《中藏经》，此固可言其伪迹显然，亦可言其别有所自。其中明目丹、扁鹊玉壶丹、破棺丹等，遗留六朝服饵金石之痕甚明，治尸厥卒痛方、三不鸣散、太上延年万胜追魂散、治虫毒方等，亦皆具方士之风。六十八方大多用药诡奇，制法独特，用法稀异。且第一至第十论，骈散兼行，文风绮丽，六朝之笔法尤著，故以其部分论与方而言之，孙氏所称“疑是六朝人手笔”之语不谬。

《中藏经》所谓与《内经》《脉经》《千金》相类似之言者，约占三分之

一,若据此则断言全由后人抄袭而成,窃以为有失公允。盖上古医经至唐代王冰整理《素问》时尚可见到《金匱》《大要》等遗篇,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著述亦均有所撰用,与仲景同时代之华佗亦自可阅及,惟各自所见之抄本有别,或各自采撷之内容及各自熔铸之方法不同而已。举如张仲景撰用之“并平脉辨证”而创六经辨证大法,以成《伤寒杂病论》;王叔和撰用之则类例相从,以成《脉经》;孙思邈撰用之则“删裁繁重”,以成《千金》。华佗当亦可撰用之,创脏腑辨证之体系,以成《中藏经》,即以脏腑脉证为中心,将上古医经及《内》《难》中杂于诸篇之诊病疗疾之内容系统归纳,熔铸己见,使脏腑辨证理论得以初步系统化、条理化,而终于奠定中医学脏腑辨证之基石。

今列举诸家之说,综合考证,结合《中藏经》完整、系统、简明、精辟、实用之五大特点,仅能初步论断如次:

其祖本可能为华佗所撰,至少可认为存有华佗遗作片断;其书经后人整理、增附,且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今之传本所据者,大约成书于六朝之时,始传世之际,即北宋末、南宋初,又再次有所增附,遂成是书。

因是书首题汉·华佗撰,故将华佗生平考略于后: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即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历代相传为东汉时期之大医家,誉为神医。首创麻沸散,崇为中医外科鼻祖。但其生卒年代莫可确考。今能据以考证之正史,仅陈寿《三国志·魏志》及范曄《后汉书·方技列传第七十二下》,而据以考证华佗生卒之年者,亦仅有七处:其一,游学徐土,兼通数经。其二,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其三,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其四,(佗死)乃后爱子仓舒病困,太祖曹操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其五,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佗学。其六,普施行之(五禽戏),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其七,阿从其言(久服漆叶青黏散),寿百余岁。

上述七处,乃正史所留之记载。其中犹可据者为二:一是以仓舒之死可逆推华佗卒年之下限,盖曹操因其爱子强死而悔杀华佗,则华佗死于仓舒之前无疑;二是以华佗卒年可逆推其生年之上限,盖“年且百岁”者,即谓寿近百岁也,而九十六岁以上则可言近百岁。其余五处则可为

之佐证。

今考《三国志·邓哀王冲传》云：“建安十三年五月甲戌童子曹仓舒卒。”故华佗卒年之下限可定为约建安十二年，即约公元207年。由此反推华佗生年上限约为汉安帝刘祜永初四年，即约公元110年。

再考《三国志·魏志》，陈珪为沛相，时在汉献帝刘协兴平元年，即公元194年；黄琬为太尉，时在汉献帝刘协永汉元年，即189年。故“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当在公元189年至194年，此时华佗已年越八十，虽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但此时年事已高，则无意于功名仕途，甚合常情，且其时已以医道而显，故陈珪、黄琬之举辟皆不就，亦符事理。吴普、樊阿皆从佗学，故吴普、樊阿之年岁亦可作为考据华佗生卒年限之佐证。据李贤《后汉书注》引《华佗别传》云：“吴普从佗学，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为禽戏。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语诸医。普今年将九十，耳不聋，目不冥，牙齿完坚，饮食无损。”而魏明帝在位为公元226年至239年。召见吴普当在此13年之内，若以明帝晚年欲延寿而召普为禽戏，则可拟召见之期在青龙五年，即公元237年左右，此时普年已近90岁，则普约生于公元146年，小于华佗36岁左右，与史实甚相吻合。

由此，可初定华佗约生于公元110年，约卒于公元207年，享年约97岁。

三、《中藏经》对脏腑辨证理论发展之贡献

鉴古观今，医籍传世与否，自当首重学术价值。若学伪术伪，则虽非伪托亦终不传，若学真术真，则虽伪托亦终不可不传。《中藏经》因伪托之名蒙尘千载而终传于世者，盖其学术思想渊源于《内》《难》，而又以脉证形气决生死，以脏腑辨证为中心独树一帜，而其著称于世者，乃《中藏经》在脏腑辨证理论发展中之创新卓见。纵观之，《中藏经》对脏腑辨证理论发展主要有如下三大贡献：

（一）新释“三焦学说”

三焦之名称，始见于《素问·灵兰秘典论》；三焦之论争，源起于《难经·二十五难》。其歧义在于三焦之名实与功能。历代医家各陈己见，

大略而言之则有：《难经·二十五难》之“无形”说；《难经·三十一难》之“部位”说；宋代陈言之“有形”说；明代虞抟之“腔子”说。继之，清代则有唐宗海之“油网”说；张杲之“右肾下脂膜”说；沈金鳌之“匡廓”说；章太炎之“淋巴系统”说等等，迄今无有定论。若言三焦之功能，则初谓为决渎之官、中渎之腑，主司水道，强调与膀胱之关系至为密切。继而谓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强调化气与行水之功能。

《中藏经·论三焦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三十二》则阐明：“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气也，号曰中清之腑，总领五脏六腑、荣卫经络、内外左右上下之气也。三焦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也。其于周身灌体、和内调外、荣左养右、导上宣下，莫大于此者也。又名玉海、水道。上则曰三管，中则名霍乱，下则曰走哺，名虽三而归一，有其名而无形者也，亦号曰孤独之腑。而卫出于上，荣出于中。上者，络脉之系也；中者，经脉之系也；下者，水道之系也，亦又属膀胱之宗始。主通阴阳，调虚实。呼吸有病，则苦腹胀气满，小腹坚，溺而不得，便而窘迫也。溢则作水，留则为胀。足太阳是其经也。”上述之论，力主无形而可分部位，此则宗《素问·灵枢》之原旨而又不悖《难经》之本意。由此可以认为：中医学定名“三焦”，初始之意乃包罗诸脏而分为上、中、下三部，因其功能“泻而不藏”而归属于六腑，且独立于五腑之外而名“孤腑”；又因基于对其功能之初始认识，而名“玉海”，此即本篇谓之“足太阳是其经也”之由来。随着对其功能认识之深化，知其能主持诸气而内清脏腑，故又名之曰“中清之腑”。上述所论三焦之功能，谓其“总领五脏六腑荣卫经络内外左右上下之气”，且明确指出“三焦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也。其于周身灌体、和内调外、荣左养右、导上宣下，莫大于此”。此种认识与总结，贯古达今，补充、综合、发展《内经》《难经》关于三焦之蕴义，使三焦之名称与功能得以较合理而全面统一。

（二）创新脏腑病机学说

《中藏经·阴阳否格论第六》言：“阳气上而不下曰否，阴气下而不上亦曰否，阳气下而不上曰格，阴气上而不下亦曰格。否格者，谓阴阳不相从也。”升降出入乃气机运行的基本形式，气分阴阳，故气机升降即阴阳

升降。人生于天地之间，顺乎天地阴阳升降则生，逆之则死。而阴升阳降方可阴平阳秘，若阴降而不升，阳升而不降，则是阴阳否格，诸病乃生，进而阴阳离决。故《中藏经》论述脏腑病机之始即明言“否格者，谓阴阳不相从也”。亦即谓气机升降不相顺接。

《中藏经·寒热论第七》言：“人之寒热往来者，其病何也？此乃阴阳相胜也，阳不足则先寒后热，阴不足则先热后寒，又上盛则发热，下盛则发寒。皮寒而燥者阳不足，皮热而燥者阴不足，皮寒而寒者阴盛也，皮热而热者阳盛也。”寒热乃阴阳所化，故辨寒热即辨阴阳，为脏腑辨证之要务，本论以“阴阳相胜”高度概括“寒热往来”实质。阴阳偏胜偏衰，则人体偏寒偏热；阴阳盛衰相胜，则人体寒热往来。此实源于《内经》“阳盛则阴病，阴胜则阳病”之基理。《中藏经》据此而进一步从先后、上下、表里论其相胜之机。其论简而不略。

《中藏经·虚实大要论第八》言：“病有脏虚脏实，腑虚腑实，上虚上实，下虚下实。”虚实乃阴阳之体类，亦病之属性。而虚实之辨，各家所据不同：或以正气盛衰分，或以邪盛正衰分，或以病与不病分，或以气血分，或以痼新分，或以寒热分，或以结散分，或以壅陷分，或以动静分，或以顺逆分，未能划一。《中藏经》以阴阳之病证、以脏腑上下之部位分属虚实之证候，脉络分明，要而不繁。

《中藏经·上下不宁论第九》言：“脾病者，上下不宁。何谓也？脾上有心之母，下有肺之子。心者，血也，属阴；肺者，气也，属阳。脾病则上母不宁，母不宁则为阴不足也。阴不足则发热。又脾病则下子不宁，子不宁则为阳不足也，阳不足则发寒。脾病则血气俱不宁，血气不宁则寒热往来，无有休息，故脾如疟也。谓脾者，土也；心者，火也；肺者，金也。火生土，土生金，故曰上有心母，下有肺子，脾居其中，病则如斯耳。他脏上下，皆法于此也。”上下，乃阴阳之所从，亦脏腑病机变化之定位。《中藏经》以五行学说解释脏腑病机，以脾脏上有心之母、下有肺之子为例，论证一脏受病则累及他脏，谓一脏不安，则上下(母子)不宁，由是则揭示脏腑病机之真谛。

故《中藏经》创新脏腑病机之学说可归结为：阴阳、寒热、虚实、上下。

(三) 创立脏腑辨证八纲

《中藏经·论五脏六腑虚实寒热生死逆顺之法第二十一》明言：“夫人有五脏六腑，虚、实、寒、热、生、死、逆、顺，皆见于形证脉气。若非诊察，无由识也。”自第二十一论至第三十二论，集中论述脏腑辨证之纲领，先总论而后分论，每论篇名均冠以“虚实寒热生死逆顺”八字，从而创立脏腑辨证之八纲。

中医学之辨证方法颇多，而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公认之“八纲”，此八纲亦公认为辨证方法之基本纲领。究其源起，则孕育于《内经》，滥觞于仲景。方隅《医林绳墨》云：“仲景治伤寒，着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然究其大要，无出乎表里虚实阴阳寒热，八者而已。”直至明·张介宾《景岳全书·传忠录》，以阴阳二纲统表里寒热虚实“六变”，方使八纲成为公认之辨证纲领，且以“阴阳”为其总纲，推演于各种辨证方法，相沿运用至今。世所鲜知者，《中藏经》源于《内经》而异流，以形证脉气为依据，创立脏腑辨证之“八纲”，即“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辨病机定性为寒、热、虚、实；辨病势预后为顺、逆、生、死。

《中藏经》自第二十二论至第三十二论均以形证脉气为依据，以“虚实寒热生死逆顺”为纲领进行脏腑辨证。如第二十二论，先述肝之生理，即与胆为表里，其经为足厥阴少阳，旺于春，嫩而软，虚而宽为正常之肝气，弦为肝之正常脉象；次述平脉、病脉；又次述以脉象而分虚实和太过、不及；又次述太过、不及诸证；又次述肝病之脉、证、形、气。以此为据而辨虚实寒热，决生死顺逆，井然有序。凡五脏则有太过不及之辨，凡六腑则仅言脉证而不言太过不及，盖仍本于五行生五脏也。其决生死顺逆，则或言死，或言几日死，或言不治，或言十死不治，或言可治、不妨，或言不治自愈，词确言明。

在论杂病各篇以后，更以“论诊杂病必死候第四十八”“察声色形证决死法第四十九”终竟诸论，其决生死法仍以形证脉气为依据，谓“五脏六腑之气消耗，则脉无所依，色无所泽，如是者百无一生”。故两论共列具决死之脉候计 116 条。

《中藏经》乃以脉证为中心分述脏腑病证之最早著作，创立虚实寒热

生死逆顺之脏腑辨证八纲,其诊断思想以形证脉气为依据,此即源于《内经》“有诸内必形诸外”之理。

综上所述,《中藏经》在脏腑辨证理论发展中主要作出三大贡献,其理论至今仍有应用价值,但尚需进一步通过临床研究使其脏腑辨证理论耀古辉今。

四、《中藏经》版本源流考略

《中藏经》因邓序之伪,托名之嫌,致使版本失源而流散。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前人、近人之初步研究,确认最早传本为南宋楼钥校本,而楼钥校本乃以闽中仓司本参校陆从老家藏本而成。此后传本之中有一卷本、二卷本、三卷本、八卷本。分卷有别,内容亦有增删,而全书篇次则一。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及陈振孙《书录解题》亦均言宋时之传本即已非一。流传至今之古本,当首推元·赵孟頫手写本。嗣后,历代刻本甚少,流传不广,但其传本系统则甚繁杂,兹列述如次。

第一系统为宋本直传系统。由宋本直接相传而来,可分为四条支系:

(一)赵孟頫手写本

自宋闽中仓司本传世之后,南宋楼钥获陆从老家藏本,“取而校之,乃知闽中之本未善,至一版或改定数十百字,前有目录,后有后序,药方增三分之二。闽本间亦有佳处,可证陆本之失。其不同而不可轻改者两存焉,始得为善本”(《楼钥跋》)。然此本亦已失传。至元初,有赵孟頫手写本两种,其一失中卷及上卷第一至九篇,存上卷第十篇(起“性急则脉急”)至第二十九篇及下卷“万应丸方”至卷终;其二失第四十八、四十九两篇。此即《中藏经》流传迄今所有传本中最近宋本者,但惜其前者传已散佚,后者传移台湾。1985年笔者多方探访,经原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胡乃长先生引见昔日上海书贾孙先生,由此追访上海古旧书店王文忠先生,辗转多途,方于上海博物馆有幸获得前种赵孟頫手写本(卷子本)。卷首题记曰:“松雪老人楷书:华氏中藏经,上下两卷。张药房题诗,谢兰生温遂之题记。毕秋珮、黎□、黄其勤、□□老考藏。”(标点系笔者所加,下同)卷末小识云:“松雪小楷多以姿媚胜,此卷用笔

朴老，兼具飞动之势，全是唐人家法，故知名贤手笔，无美不备，不可以一格限也。舟山黄其勤观并识。”后附张药房先生题句（里甫谢兰生补录）及跋云：“今观此卷，是规摹唐人写经体，与平时笔意稍别。”卷后题为“嘉庆甲戌五月七日里甫跋”。卷尾具明“华氏中藏经上下二卷，赵松雪真迹。得于周文甫妹夫者，怡可姪入京，举以为赠。道光八年岁戊子冬十有一月，二楼楼长记”。目前，有从书法艺术角度疑为仿写本者。张药房先生题句中有“此经仅存赖此迹”之句，里甫跋中亦曰：“赵学士言，一日可写万字，又云赵魏公书，人但知自魏晋中来，晚年则稍入李北海耳。尝见千字文一卷，以为唐古人字，绝无一点一画似公法度，阅至后方知为公书。”又曰：“药房先生晚年专学此贴，当临一本遗友人。”故即使为仿写本亦绝不影响其校勘价值。此乃宋本直传系统中第一支系——赵写本之存佚及其此次其一复出之始末。赵本分三卷，无邓序。

（二）《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

《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明·吴勉学校刻（鲍士奇同校）。为八卷本，其中又有八卷一册、八卷二册、八卷三册、八卷五册之别，有邓序。八卷一册有万历版（载《续中国医学书目》）；民国版（载《中国医学书目》）。八卷二册有万历版（载《续中国医学书目》）。八卷三册有明版（载《续中国医学书目》）。八卷五册有日本宽保二年刊本（堀元厚鉴定，吉冈玄昌训注，载《中国医学书目》）。嗣后，本系统有上海书局刊本、徐舜山刊本、冯烘记刊本、文瑞楼石印本、千顷堂石印本、蜚英书局石印本。

1982年，笔者搜求自原湖南中医学院（现为湖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道光十四年永德堂何尤瑛手抄本，此手抄本乃据医统本所录，字迹清晰，笔画秀丽，全书无缺，惜其多处为蠹所伤。又自成都中医学院（现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凌一揆教授（已故）家藏中求得亡名氏手抄本，此手抄本乃据徐舜山刊本所录，完整无缺，足见流传至日本及我国民间者以此系统之版本较多。

（三）明·江澄中刊本

此刊本载于《孙氏书目·内篇》卷二及《四库书目·邵注》卷十，为三卷本，已佚。然据日本冈西为人称：“按明版《医统正脉本·卷八》末有木

记曰：青莲山人江中澄重校师古斋，又卷二末、卷四末并云：新安陈正道抄本，吴勉学校刻，而江吴两刊之关系，今不可考，其江中澄、孙氏以下诸家著录，并作江澄中，今尚未知孰是。”

(四)清·周锡瓚重订本

此刊本有二卷二册(载《聿修堂藏书目录》)；有三卷一册(载《宝素堂藏书目录》)。周锡瓚跋云：“余得旧抄本，前后多缺，无序文目录并楼公跋，且避高孝两朝讳，疑即攻媿所校本。因取新安吴氏刻本补其缺……然已与吴本迥别矣。”1983年，笔者自原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搜求得一朱批之八卷本。卷首、卷二末、卷四末及卷尾题记均与冈西为人所称相同，惟扉页题曰“周锡瓚本以朱笔校之”，卷末题曰“丁卯九月庚申校奈须恒德”。且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搜求得到周锡瓚本(扫叶山房本)，奈氏所校皆然。周锡瓚本源于楼钥校本，属宋本直传系统。瓚本堪称珍本。

第二系统为赵本辑合系统。清·孙星衍先后获两种赵孟頫手写本，“前后二本，校勘明本，每篇脱落舛误，凡有数百字，其方药名件、次序、分量，俱经后人改易，或有删去其方者。今以赵写两本为定”(《华氏中藏经·孙序》)。故本系统之传本乃孙氏将赵孟頫两种手写本辑合而成，收入《平津馆丛书》，有阳湖孙氏刊本、朱氏翻刻平津馆丛书本、商务印书馆及人民卫生出版社据平津馆丛书印行之单行本，为三卷本。

第三系统为赵本发展系统。清·周学海校本，附“内照法”，收入《周氏医学丛书》，有光绪辛卯自刊竹纸本、《中国医学大成》复刊本、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周学海序云：“又有内照法一卷，云出于华氏，此必有所据，《脉经》曾引用之，但不言出自佗耳。今于前三卷悉遵孙本，其间字句错落，为检《内经》《脉经》，略加补注于各篇之末；其高宗、孝宗庙讳字样，悉改用本字，以从其实；坊本方三卷，题为附方，并内照法附刻于后，以别于孙本焉。”显见周本始由赵本发展而来，亦即自赵本加坊本、内照法而成。

笔者自1980年代初，即从先师李聪甫研究员及师兄刘祖贻研究员潜心研究华佗及其《中藏经》，执笔《中藏经校注》《中藏经语译》，承蒙国内外诸多学者之指导，受益良深。嗣后，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加强医理注释及语译,以广交流与应用。此次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三批全国优秀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之研修人员阅读医药古籍之需要,再次释译,此则在以上两个版本基础之上,结合近年研究之心得,予以修订、增删。

中医古籍实为中医药学术继承与创新之源泉,然释译中医药古籍亦为艰辛倍有之研究。《中藏经》校注曾三历寒暑,此次释译又两载有余,虽数易其稿,反复推敲,但由于水平所限,且由于千百年来历代医家对《中藏经》未曾深垦精耕,因而谬误之处,殊为难免,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孙光荣谨识

2014年2月

凡 例

一、本次释译以李聪甫研究员主编、刘祖贻研究员协编、孙光荣执笔之《中藏经校注》《中藏经语译》(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1990年8月第1版)为基础,进一步精释、精译而成,着重加强中医名词术语之注释,以利“国优人才”研修以及国际交流。

二、本书校刊所用之底本、主校本、参校本、旁校本分列如下:

(一)底本: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太岁戊辰春平津馆孙氏刊版,即孙星衍点校本,简称“孙本”。

(二)主校本:其一,元·赵孟頫手写本(上卷第十篇“性急则脉急”至第二十九篇及下卷“万应丸”至卷终),简称“赵本”;其二,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周锡瓚点校本(扫叶山房本),简称“瓚本”。

(三)参校本:其一,光绪丁未年(公元1907年)重印朱氏校刊《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简称“医统本”;其二,日本宽保二年(公元1742年)刊本,简称“宽保本”;其三,光绪庚辰年(公元1880年)徐舜山校刊本,简称“徐本”;其四,光绪辛卯年(公元1891年)周学海校刊本,简称“周本”。

(四)旁校本:其一,《黄帝内经素问》,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6月第1版;其二,《灵枢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64年第1版;其三,《难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第1版;其四,《脉经》,人民出版社1956年影印元代广勤书堂刊本。

三、本书之校勘原则与方法为四校合参,以对校、本校、他校为主,理校为辅。出校以“本善结合”为原则。在全面、周密、细致勘同录异基础上,订讹补阙,厘定是非。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一)凡孙本与校本互异之处,属孙本是、校本非者,概不出校;属孙本显误而校本是者,据改之后出校;属校本义长,可改可不改者,不改,出校列出校本字样,并示明“义长”;属是非难定者,不改,出校列出校本字样,或同时示明“疑是”“疑误”“可从”“可参”。

(二)凡孙本避讳字,如“孝宗庙讳”之“慎”字,“高宗庙讳”之“构”字,悉恢复本字,以从其真,并出校说明。

(三)凡孙本中之异体字,则以正体字律齐。原文、注释均采用繁体字。

四、本书之释义以“字求其义、句索其旨”而直解原文,以疏通医理为目的。力求解释疑难而避免求深反晦,力求阐明原旨而避免以古律今。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一)凡难解、意晦之词目,概予出注。

(二)凡中医药名词术语之注释,先列该名词术语所属范畴,次注明首见出处,再予以注释。若有重要之歧说者,一并列举。凡同一名词术语,只注首出之处。术语之注释主要参阅《中医大辞典》(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朱文锋主编《实用中医词典》(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1版)等。

(三)凡因音义有歧而影响对原文理解之字词,必予注释。

(四)凡古今字、通假字之易于识别者,则不一一出注,较生僻、易混淆、易致疑致惑者,则予出注。

五、本书之今译以信、达、雅为原则直译原文。“信”以忠于原文,“达”以沟通古今,“雅”以词达意顺,译文力求“段段相合、句句相符、词词相应”而完整再现原著内容与风格。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一)对应:凡古今句式基本一致者,遵照原文句式将应译之词用以该词为语素之现代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译出。凡中医药名词术语已经注释者,译文中保留原词。凡现代汉语中已不使用之虚词如发语词等则不予译出。

(二)替换:凡古今词义差异明显者,换以现代汉语中可以替代之词语译出。

(三)调整:凡古今句式差异明显者,按现代汉语语法调换词序译出。

(四)增补:凡因古今语法差异而致原文可缺而译文不可缺之处,在该句中适当增补字词译出。